



LUN CAISHUI GAIGE

论财税改革

李文进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论 财 税 改 革

李文进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财税改革/李文进著.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 - 7 - 5095 - 6533 - 9

I. ①论… II. ①李… III. ①财税 - 财政改革 - 内蒙古 - 文集 IV. ①F812.72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13506 号

责任编辑: 庄 莉

责任校对: 张 凡

封面设计: 邹海东

版式设计: 兰 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142

营销中心电话: 88190406 北京财经书店电话: 64033436 84041336

北京厚诚则铭印刷科技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 × 1092 毫米 16 开 24.5 印张 527 000 字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60.00 元

ISBN 978 - 7 - 5095 - 6533 - 9/F · 5261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本社质量投诉电话: 010 - 88190744

打击盗版举报电话: 010 - 88190492, QQ: 634579818



▲ 学然后知不足，作者在办公室学习。



▲ 作者庐山留影。



▲ 作者同许毅老师、何振一老师、喜旺好友在呼伦贝尔达赛湖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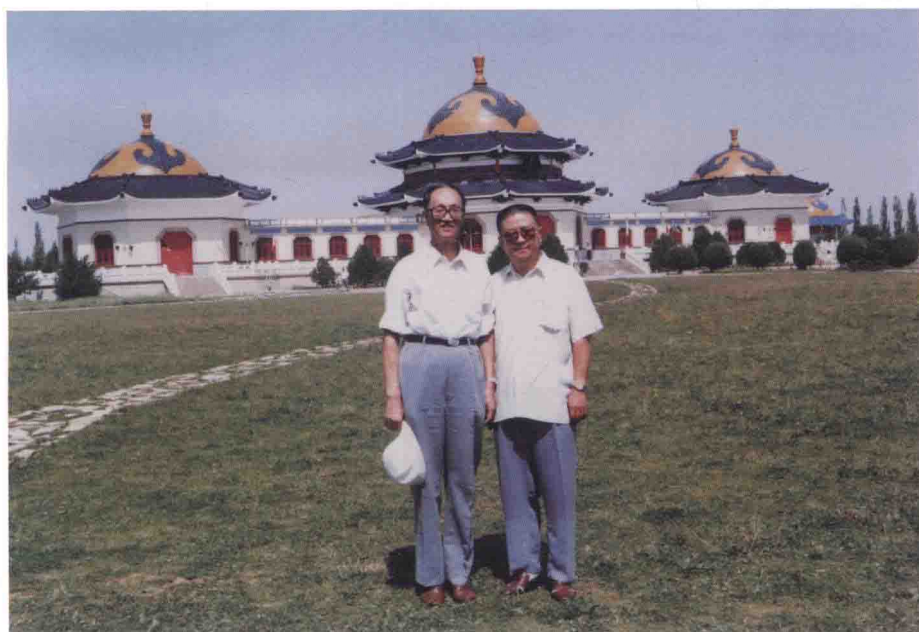
▲ 和宋新中、黄菊波、孙毅、杨振威等老师在一起。



▲ 作者同许毅老师、金墨言老师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留影。



▲ 作者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留影。



▲ 作者同宋新中老师在成吉思汗陵合影。



▲ 作者和好友李洪波在呼和浩特哈素海。



▲ 作者在美国与一家人合影。

挑灯看稿话改革

(自序)

(一)

春天，静夜的灯光下，我对着自己三十多年前的文稿。一篇篇鲜活的文字，又把我带回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那激情奔放的改革岁月，多少个不眠的夜晚，多少次的争论探索，多少师友的谆谆教诲，仿佛一下子都又聚拢到这春天的静夜的灯光下。抚今追昔，不胜感慨，心里泛起的是对师友的追忆和尊敬，也有同道间不断深厚的情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在我党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它开创了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起点，开启了国富民强中国梦的新征程。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如同一声春雷，驱散了中国土地上的阴霾浊水，为我们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它的召开距今已过去35年，35年弹指一挥间，当时的我还是一个35岁的青年人，如今步入“耳顺”之年，“人生亦老天难老”，岁月不饶人啊！

35年前，那时的我很不懂事，大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不知天高与地厚，敢说敢道，大有毛主席诗词中所说的“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模样，喜欢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对内蒙古自治区财政的几点认识》，这是自1964年我被分配到自治区财政厅预算处以来，接触到财政工作的一些体会和总结。当时的预算处是个温暖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有令人怀念的自治区原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部长周君球同志；有勤奋好学，对后辈谆谆教诲的长者、预算处处长王荣谦同志；有稳持成重，精通业务的李文侯副处长，还有王布，郑焕卿、刘可、李健、史英歧、刘彦君等老前辈，这些人手把手教我、指导我，使我尽快成长的、可歌可敬的各位老师仍历历在目，近在眼前。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可敬的老师，有的已作古，有的也已到耄耋之年，手脚行动都不太便利了。如今回忆起来在预算处的岁月，带给我的仍是一片温馨的阳光。

《对内蒙古自治区财政的几点认识》是我在财政厅学习和工作实践中不断学习探索的成果，也是在老师们指导下蹒跚学步的答卷。这篇论文发表在财政部1980年第51期

《财政研究资料》上，当时的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的董霞飞同志任编辑部主任，后来又担任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他奖掖后进，慧眼识珠，论文很快发表。董霞飞副所长也已故去，写到这里，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清晰可见。

《对内蒙古自治区财政的几点认识》一文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不久，正本清源的工作也在逐步展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能敢于直面自治区财政的困难，有针对性地提出存在的问题，分析其中的原因，并提出自己对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办法，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30多年前的许多看法和建议，现在仍鲜活简洁并不过时。经过岁月的洗礼，今天读来也还是蛮亲切的。

我发表的第二篇论文是本书的第一篇文章：《做好开发准备，迎接战略重点西移》，这是一篇酝酿许久才拿出来文章，发表于1984年《内蒙古社会科学》第3期上。

西部大开发是我国地区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实现国民经济“三步走”战略中第三步发展目标的关键性战略步骤，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和可持续发展诸多方面，是一项国富民强的一个巨大工程。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战略，提出了中国宏观区域市场经济的“两个大局”的思想，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那时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1999年6月17日，江泽民总书记在西安举行的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应该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明确提出，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特别是抓紧研究西部地区大开发。”他强调，“加快开发西部地区，对于推进全国的改革和建设，对于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一个全局性的发展战略，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条件已基本具备，时机已经成熟，从现在起，这要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1999年初，江泽民总书记在内蒙古视察时指出：“力争使内蒙古成为我国下世纪经济增长的重要支点。”内蒙古以其不可替代的区位优势，无可争辩的资源优势和强大的影响力，及具有全国意义的生态北方屏障决定了在未来全国经济协调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内蒙古将成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支撑点和新的增长点。同时，内蒙古具有向北开发、开放的后发优势和良好的政治经济基础，机遇在前，使命重大。

我们这篇文章是内蒙古最早发出“做好开发准备，迎接战略重点西移”的声音的。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的何文阁研究员，为这篇文稿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并提出了许多大胆的思路，来指导文章的完善和充实。在这篇文章中，许多论断今天读来仍是震聋发聩，诸如“内蒙古自治区是国内的经济不发达地区。由于它所处的政治、经济、国防上的重要地区，决定了它在大开发中首先开发的必要性。先行开发内蒙古，为下一世纪开发大西北做

好准备，就必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一环节的成败，将关系到整个开发的全局。”“提前开发内蒙古，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现在，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得兼，条件很好，机不可失，时不我待，提前开发内蒙古的重要性将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文中明确提出了开发内蒙古、迎接西部大开发的若干重要的政策建议，具体有：

1. 资源的全面开发必须有稳固的农牧、林业基础与之相适应，否则，开发是难以成功的，必须看到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开发应重点考虑生态平衡的重要性。

2. 必须选准开发的优势产业和优势产品，为西部大开发和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做好配套资金的准备。

3. 智力开发，教育先行，是科学技术进步的根本所在，也是必须的人才准备。

4. 富民强国，运输先行，动脉畅通，货畅其流，整个经济才能活起来。

《对内蒙古财政经济的改革的几点建议》是我在 1984 年内蒙古党委政策研究室召开的深化内蒙古经济改革座谈会上的一次发言整理而成的。当时的背景是：这一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的一年，农村改革继续深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快，计划管理体制，价格管理体制，商业体制，建筑业体制，工商税收管理体制等多方面都进行着新的改革和探索。特别是解决国家和企业分配关系的第二步利改税的改革，从税利并存过度到以税代利，企业与国家的分配关系以法令的形式固定下来，使财政收入能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稳步增长，企业也能从增加的利润中增加较多的收益。由于改革的不断深入，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国家的财政状况进一步好转，与此相对应的，内蒙古的各项改革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财政方面的改革却相对滞后，相关改革进展缓慢而财政收不抵支的拮据局面仍没有根本改观。正是在这种急盼财政改革的期望中，作为一个财政厅的小萝卜头，提出了对自治区财政改革的期盼和建议，这些建议今天写来似乎是微不足道，但在 20 世纪 80 年代，在各方面都在正本清源和拨乱反正的情况下，能直言财政的转轨定向问题和端正财政工作指导思想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和承担的。“建议”中首先提到：在城市经济改革中，财政体制的改革是个焦点，财政部门要支持改革，促进改革，在改革中争得主动权。这就首先要解决转轨定向问题，即财政工作的立足点，真正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积极支持生产的发展，大力组织财政收入。我当时认为，自治区财政工作的指导思想，还没有切实转到这个轨道上来，自治区的财政，至今仍是守摊财政，而不是创业财政，财政工作仍是习惯于在收支支上打圈子，而不习惯于在发展生产、扩大财源上想问题，不善于在赚钱和赚大钱上做文章，只是就财政论财政，忘记或者放松了发展生产、增加收入这个大头。长此下去，自治区的财政势必脱离经济，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这就叫单纯的财政观点。

实在讲，作为财政厅的一个小干部，一个小萝卜头，敢于在区党委刊物上发表批评自己单位是“单纯财政观点，是守财奴”，这需要很大勇气的。当时我的思想斗争也是很激烈的，曾经彻夜难眠，怕捅了漏子，惹来麻烦，思想反复也很大，斟酌再三，骨梗在喉，

还是一吐为快。

特别是“建议”的最后一条，对自治区经济力量的整合问题，这是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又一个重大问题，需要自治区主要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写到这里，使我想起刘云山、田聪明同志领导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战略处和各部门研究机构的同志们在一起研究内蒙古发展战略的那激动人心的场景，正是由于他们的组织领导和大力支持，才使得当时相对落后的内蒙古也能发出震聋发聩的声音，也不甘人后地参加了很有影响力的莫干山等全国性会议。

在本书第一编中所选的十七篇论文中，大家不难发现，有相当的篇幅都是紧紧围绕着资金问题而展开的。诸如：《呼和浩特市经济发展中的资金问题》、《内蒙古社会总财力研究》、《运用好民族地区社会总财力，加快沿边发展进程》、《“十五”期间内蒙古财政资金状况及资金供需研究》、《加大内蒙古农牧业资金投入的对策研究》等，这些文章构成了内蒙古系统的资金问题研究。资金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血液，是发展前进的动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切不可等闲视之。大家知道，资本积累和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一般来讲，没有资本积累和资本形成就不可能进行扩大再生产，也就从根本上制约了经济增长的动力，所以，资本积累和资本形成就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中心问题。现代社会再生产的基本特征是扩大再生产，而不断扩大再生产就需要不断资本积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把剩余价值当作资本使用，或者说，把剩余价值再能化为资本，叫做资本积累。积累就是资本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资本积累最直接的形式就是资金的积累，也就是如何解决地区发展中的建设资金积聚问题。对这一问题重要性的认识，邓小平同志1991年视察上海时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这话深刻地揭示了资金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明确昭示资金始终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这个核心问题不解决，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它的经济运行没有了核心，也没有了血液。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们探索研究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资金问题。

首先，民族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在准确把握自己的发展方向和战略措施的前提下，需要解决的首要的还是建设资金的筹集和使用问题。正如文中所说：“我国实现21世纪的战略目标，首要的问题是资金不足。呼市的发展，当然首先也要解决资金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资金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四化建设的成败，资金成为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呼和浩特发展中的资金问题》）

其次，在解决对资金问题重要性认识之后，如何解决内蒙古和各盟市发展中的资金问题就摆在眼前。我们的研究结论是：①解决资金问题首先要靠自己内部积累的迅速增长，立足现有基础，发挥内生动力，挖掘资金潜力，统筹自己的社会总财力，迅速提高现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这就叫“自力更生为主”，这样聚集的资金才能珍惜，才能用到刀刃上，才能发挥效益，这也叫“汝欲苦学诗，功夫在诗内”。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会长和著名

经济学家大来佐武郎在谈到中国经济的发展时曾语重心长的提醒我们：“日本经济发展资金主要靠自己内部的积累，以 1968 年为例，这一年日本企业的内部积累为 230 亿美元，占到 70.5%；企业外部资金 95 亿美元，占 28.3%；外国投资为 4 亿美元，占 1.2%。”他同时指出：“日本建设资金主要通过实现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来取得的，主要就是大量引进新技术，加上经过训练的熟练劳动力，迅速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使生产较快增长，而消费水平不是提高很多，其差额就作为建设资金来源，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构成良性循环。”再次，向调整产业结构要资金。产业结构的调整是积聚新的生产资金的直接源泉。优化产业结构是扩大再生产中永恒的主题。一般来讲，优化产业结构就是要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所谓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就是使产业结构达到有序的协调状态，也就是对失衡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使之与资源环境，科技水平，人口规模的国际、国内经济主源的协调与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创新和提高的调整，在呼市这一类经济不发达的三四线城市来讲更为重要。所谓产业结构高度化，是指在一定发展总量条件下实现产业结构高素质化的过程，这包括三次产业结构水平的优化，第一二产业的产值和剩余劳动力逐渐有效地向第三产业转移；其次是生产由劳动和资源密集型向智力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转移，使新兴产业不断兴起。最后，向科学的经营管理要效益，要资金。科学管理是一笔巨大无形的财富，是提高经济效益增加资金流量的最为现实的力量和手段。国内外加强管理出效益、出速度，出财源的事例屡见不鲜。内蒙古地区企业普遍地存在着管理不严。跑冒滴漏严重的问题，每一个环节都大有潜力可挖，尤其是资金中的冒滴漏更是普遍，挖潜改造的资金潜力更是大有可为。

本书中多篇关于筹集建设资金探索仍是初步的，我们知道，资金之树常青，我们仍在探索。

（二）

民族问题是我国改革开放总问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工作对于改革开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关系全局的重大意义。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不断研究和探索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中国采取民族区域自治这一政治制度来解决民族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的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个里程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明确载明“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这一基本政策的确立是基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践和理论，也是处理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法”。

目前，世界上仍有 3000 多个人口多少不等的大小民族，分布在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大部分是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对我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一个不可忽视

的重大政治和经济问题，是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团结进步的重大问题。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照耀耀下，各民族团结、平等、互助、友爱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定。为了积极地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认真研究民族地区的财政问题是十分重要的。民族地区财政，是我国社会主义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来说，国家的长治久安，有赖于各民族的团结；我国的经济振兴，有赖于以民族地区为主的西部地带的开发。因此，正确地对待民族地区财政问题，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来说，都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消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实现民族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总任务的一个部分，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在无产阶级取得革命政权以前，民族问题的实质是个阶级斗争问题，而无产阶级取得革命政权以后，民族问题的实质就成了经济和文化问题，就变成了如何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问题。

财政是一个经济范畴，它是人类社会为满足自身的公共需要对剩余产品的占有和分配。考察人类社会历史，民族兴衰，国家的兴亡，社会形态的更替都同一定历史时期的财政实践、财政政策和财政制度密切相关，财政实践、财政政策和财政制度总是对社会生产、民族繁衍和社会政治制度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民族地区财政，就是为了繁荣和振兴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经济是财政的基础，只有繁荣和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地区的财政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为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彻底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落后面貌，经过 50 年的革命和建设，特别是近十年的改革与发展，在这方面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民族地区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财政状况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就总体而言，民族地区的经济状况和财政状况在短期内还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改观。甚至在一国之内，民族地区同东部沿海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可能急剧扩大，如果不及时注意投资战略重点的西移，将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更大的隐患。因此，研究民族地区的财政经济问题，不论是从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问题是必要的，就是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战略来讲，均衡地发展各地的经济文化也是必要的。

民族地区财政，是我国社会主义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属于地方财政范畴，必须在全国统一计划，统一政策下开展工作，这是与一般地方财政具有共性的一面；同时，它又是民族地区财政，又有与一般地方财政所不具有的个性的一面，亦即其特殊性的一面。因此，正确地理解民族地区财政的特点，是我们研究民族地区财政问题的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研究民族地区财政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和财政理论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以及同各个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最大限度地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中理清我们的思路，以此来开展我们对民族地区财政经济的研究。

中国的民族地区的财政经济研究，可谓源远流长，前赴后继。这一方面的研究在中国学人的不懈努力之下，如丝如缕，绵延至今而从未中断。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就是这一方面研究的先驱，他的不朽著作和开山之功，如今在中国的学术界仍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费老在其《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前记中说“民族研究工作是我不生学术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的社会调查工作就是从少数民族开始的。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民族调查可以说是认识社会和文化的基本功，要认识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基本面貌，最好能从对各种不同民族的社会和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入手。有比较才有鉴别。对不同个性的综合分析才能得到共性的认识”。

“1935年我在清华大学攻读人类学时，导师史禄国先生在我毕业后准备出国深造时，要求我找一个同自己生活习惯不同的少数民族社区进行现场调查。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并在他的指导下和前妻王同惠选择了广西大瑶山地区的花蓝瑶人作为调查对象。王同惠在此调查中不幸牺牲，我也受了重伤。这次调查计划没有完成，我所搜集到的各村瑶人人体测量数据后来又全部丧失，我只主要根据王同惠的调查材料，写成一本《花蓝瑶社会组织》，其后我在回家乡养伤时进行了“江村”调查，转向了农村调查直至解放之初。”

“解放后，1950年我参加了以宣传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和对各地少数民族进行初步调查为任务的中央访问团，并担任广州分团和广西分团的团长，深入贵州和广西两省的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有两个年头。1952年我调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1955年到贵州进行民族识别，1956年参加了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少数民族历史调查。这一段时期大约有七年之久，我一直和团内各少数民族发生接触和联系，并有机会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到1957年反右运动后，才告终止。”

“这样又过了二十多年，到八十年代初，我开始恢复正常的社会地位，并以‘三访江村’重新开始我的社会调查工作。为了开发边区，看到了民族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再次点燃了我对民族调查的热情。1984年我初步完成江苏省的小城镇调查后决定把研究重点转移到边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着重做了农牧结合和城乡结合两个题目，进而产生了全国一盘棋的观点。民族研究成了我们社会学研究中的重点项目之一。”

和费老及其团队一样，在我国的财政经济领域也一直活跃着一支研究队伍，这支队伍的带头人是财政部的一些老领导和各民族省区的财政部门的领导和从事财政科研工作的中青年同志，正是他们的亲力亲为，无私奉献才有了中国民族地区财政研究的欣欣向荣的今天。

中国的民族地区财政研究是1980年底中国财政学会在昆明温泉召开年会时，广西、内蒙古、宁夏、新疆、云南、贵州、青海等省、自治区财政厅的领导和同志们积极建议下，要求大家组织起来进行民族地区财政的工作交流和理论研究，这一提议得到财政部和财政学会领导的赞许和同意。当时即由广西财政厅厅长冀龙同志牵头并召集民族地区同志开会，中国财政学会副秘书长李海负责具体事务联系，于1981年在宁夏银川贺兰山宾馆召开民族地区财政研究会第一次财政理论和实践研讨会。五个民族自治区和三个享受少数

民族自治区待遇的省（滇、黔、青）共八个省区的财政厅领导和科研所同志参会。会议决定在财政部和中国财政学会领导下筹建中国民族地区财政研究会，会上选举广西财政厅厅长冀龙、内蒙古财政厅副厅长周君球，财政部财政科研所副所长葛致达为牵头领导小组成员，组长为冀龙，周和葛为副组长，李海教授代表中国财政学会秘书处参与工作，会议还决定 1982 年在内蒙古召开第二次中国民族地区财政理论讨论会。

民族地区财政研究会第三次年会 1983 年 11 月在贵州贵阳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全国人大、政协民族委员会、八省区财政厅领导和科研所的同志，还有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遵化地区、青海果洛自治州、湖南湘西自治州、贵州省各地州、市财政局的同志、新疆、内蒙、云南、贵州财经学院和民族学院的教授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上，当时的中国财政学会会长，财政部副部长戎子和同志参加了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题目是《大家都来研究民族地区财政问题》。戎老指出，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十分重视民族地区工作，小平、耀邦、紫阳等中央领导同志，几次视察西藏、新疆、青海、内蒙古等民族地区，指导工作，特别是最近中央提出要开发大西北，要使大西北成为我国 21 世纪的一个重要工业基地，西南地区也在开发之列。中央已考虑把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从沿海和内地逐渐移到西部地区。西北、西南大部分是少数民族地区，因而开发西部地区也主要是开发少数民族地区。

民族地区要开发，我们财政怎么办？这是摆在我们财政理论工作者面前的新课题，需要我们去研究。理论应当走在现实的前面。

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反作用于经济。财政的主要职能作用，一是促进生产发展，二是制约生产的盲目发展。应当研究经济开发，促进经济开发，提高经济效益，也应当研究如何发挥财政的制约作用，使经济开发稳定顺利进行。

“理论的研究确实很重要。希望同志们回去要在财政部门、在民族地区掀起学习理论的高潮。应该承认、我国的财政经济理论还比较落后，建国三十多年来，我们在培养干部提高理论专业知识问题上是有缺点的。现在既然发现了，就要抓紧解决。贵州已发现这个问题。已开始抓这个问题，这很重要。我看了同志们的文章，说到民族地区的财政经济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列宁讲的、斯大林讲的、或者毛主席讲的，这是对的。我们研究财政理论问题，一定要首先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财政理论，再就是大家要钻研当前我国四个现代化的社会经济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中有一部分问题，我们财政理论界、经济界还要研究，还要发展。比如说，社会主义理论问题、财政体制、经济体制问题，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完全解决，而且也不可能完全解决。因为社会是发展的，有的问题今天解决了，明天又发生；这个问题解决了，又冒出个新问题。所以同志们除了研究经济理论以外，一定要结合实际深入调查，研究工业、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技术问题。要通过调查研究，为解决问题，提出充分的根据。关于我们的民族财政体制问题，根据我向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了解，他们说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大概今年是肯定拿不出来，明年行不行，还是个问题。看样子要拿出个总体方案，最早还得到一九八五年。

那时是不是就把我们中国的财政体制解决得尽善尽美，也不可能，因为社会主义还要进一步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相当复杂，各个地区不一样，将来在全国的大体制之下，对一个民族自治区，或者一个自治州县也还要适当照顾特殊性，不能用一个模子去框。”

“希望同志们除了自己学习以外，要特别注意办训练班，提高广大财政部门干部的理论 and 业务水平。特别要注意培养青年干部。我最近了解些情况，比如贵州，他们抓文化教育，经济文化一起抓，这是完全正确的。不提高知识不行，现在我们进口的一部分机器，不会用，放在那里，或者一用就搞坏了，我们应该承认，我们还落后。”

“参加这次会议的各省负责同志，多数是退到二线、三线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是在二线半。这有好处没有呢？我看有好处。我们这些老同志，至少在财政界说话还多少有些作用。我们现在老了。不能干繁重工作了。但参加个会议，发挥一些余热还是可以的。希望我们回去只要有机会就对财政界说几句话，鼓励鼓励。”戎老的讲话，为我国的民族地区财政研究工作指明了发展方向，也鼓舞了研究队伍的士气和信心。

我国民族地区的财政研究工作之所以不断发展并取得丰硕成果，是和有像费老、戎老这样的老专家和老领导的大力倡导和支持是分不开的。在中国的国情里，领导和专家的支持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因素，1986年5月，戎老又一次参加了在广西召开的民族地区财政研讨会。今天我们读起费老和戎老的讲话，仍感到是鼓舞、信心和力量！没有他们老一辈领导和专家的高瞻远瞩，没有他们大刀阔斧的鼓励和推动，可以说，民族地区财政研究就没有今天的光荣与梦想。

民族地区财政研究会成立至今已有30多年了，而立之年的民族地区财政研究在稳步前进。1981—2004年的20多年间，民族地区财政研究会共召开十三次年会和理论研讨会，1983年在贵阳年会上选举德高望重的内蒙古财办原主任，内蒙古顾问委员会常委金墨言同志（蒙古族）为牵头领导，筹建和组织研究会的各项活动，对民族地区财政理论和实践工作做出了不少的贡献。他对少数民族地区穷困情况有着深入的了解和深切的感受。

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民族地区财政研究会顾问，我国著名的财政专家许毅教授对民族地区财政研究工作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支持。1999—2000年由许老亲自带队，由财政部财科所、国家农业开发办、中华财会咨询公司、四川省财政厅的同志们三次赴四川阿坝、西昌等民族地区调研，对长江上游流域的生态平衡、自然灾害、移民开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并写出了三份有理有据和针对性很强的报告上报财政部、国务院，引起了领导和地方同志的重视和好评，更令人难以忘记的领导还有：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财政部财政科研所副所长刘正言和星光同志，他们亲力亲为，尽管年事已高，还带领我们这支研究队伍深入到内蒙古的农村牧区、广西的“东兰巴与凤”贫困地区调研，访贫问苦，发现和研究问题，在实际工作中提高队伍的研究能力和工作素质。两位老领导的音容笑貌，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中，成为我们学习和效仿的榜样。

各省自治区的领导也给予民族地区财政研究工作以极大的支持和关怀。内蒙古自治区

的原财政厅厅长、财办主任、自治区顾问委员会常委金墨言同志，财政厅原厅长吕林同志和李欣泉同志，财政厅副厅长、审计厅厅长王国盛同志，财政厅副厅长云清同志，总会计师高振源同志，广西财政厅厅长刘鸣山，副厅长黎灼仁，云南财政厅副厅长王仁学，宁夏伊斯兰投资公司总经理洪兴波，还有陈辰（广西）、杨振威（宁夏）、王捷（新疆）、林道如（贵州）、纪厚（云南）、张汉兴（青海）等热情支持并直接参与了民族地区财政研究会组织的对内蒙古、广西地区的调查研究，先后编辑出版了七部民族地区财政研究论文集，近 140 万字。对内蒙古财政经济情况的调研，先后在东部三盟一市，西部二市的城乡牧区，工矿企业、学校进行，历时五十多天，研究了内蒙古的资源情况和开发远景；时政经济状况政策措施，写出了有关内蒙古农牧业、工业、商贸流通，互教互生、财政体制等六篇主题报告，受到自治区党政领导的重视和好评。

继内蒙古调研之后，于 1986 年 4 月 2 日到 4 月 30 日民族地区财政研究会又组织了对广西财政经济状况的调查研究。参加这次调研的有：财政部及所属财政科研所，内蒙古、新疆、宁夏、西藏、广西、云南、贵州、青海、甘肃、湖南 10 个省、自治区的财政厅、民委的同志和大专院校的老师共 35 人。广西自治区计委、经委、民委、财政厅、扶贫办、乡镇企业局等分别介绍了有关情况。具体分为四个组，分别深入到广西的几个地市，19 个县，28 个乡镇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深入调查。山区组的同志翻山越岭，访贫问苦，研究探索山区的脱贫致富问题；边境组深入到边境县和边防哨所了解情况，广泛征求意见；边境军民团结一致守边防的英勇事迹对大家教育很大，大家深受感动。财政政策组和工业组的同志深入到工矿和乡镇企业，同有关厅局和地市县的党政领导多次进行座谈。调查组所到之处，受到各级党政领导重视。广西自治区主席韦纯来、副书记梁成业等领导亲自听取汇报并做了重要讲话，对这次调研给予充分重视和肯定。

本书的中编“中国民族地区财政研究”中所选的十一篇论文和调研报告，就是在民族地区财政研究会这个大家庭温暖如春的大背景下耕耘出来的，也算是一个小兵对民族地区财政研究贡献的一点汗水和辛劳的写照。

（三）

近日，偶读《郑板桥家书》，深有受益。这是中国“齐家”文化的代表作，很有代表性。在《礼记·大学》中云：“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是自古以来国人所倡导的“修齐、治平”的立身原则。郑板桥在家书中秉之以理，发之以情，饱含对子女殷切的期望，谆谆劝戒似春风春雨，用心良苦，唯以真面目示人。

《家书》的开篇，这个怪人便开宗明义：“板桥诗文，最不喜求人作序。求之王公大人，既以借光为可耻；求之湖海名流，必至含讥带讪，遭之荼毒而无可如何，总不如不序为得也。几篇家信，原算不得文章，有些好处，大家看看；如无好处，糊窗糊壁，复瓠复